

殖民下的精神荒蕪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中的殖民性接受過程

崔末順*

차례

1. 이끄는 말
2. 文法化(grammaticalization)의 機制
3. 被動標識의 文法化
4. 맺는 말

一、前言

1895年台灣的淪為日本殖民地，以世界史的眼光來看，可說就是西方現代文明以全球規模擴張其勢力的一個結果。亞洲地區最先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日本，透過明治維新，打破了封建體制，奠下其遂行資本主義的基礎，並進而參與殖民地開拓的帝國主義行列。在此歷史脈絡中，台灣不幸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與西方國家由下而上的市民改革所不同的，日本係以天皇為中心的軍人和政治家集團，構成社會改革的基礎勢力，因此它的近代化進展，可以說是在其追求西方現代的同時，所建立起自我民族主體的一個過程。看似矛盾的這兩種時代精神，在日本從封建社會轉換到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呈現出多重並存、拮抗辯證、顯隱互現的複雜關係，它一方面成為日本近代化過程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經營殖民地台灣的基本政策內涵。

日本在台推動的同化主義政策，是在內地延長主義和一視同仁的原則上，傳播西方

*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tclmschoi@ccu.edu.tw

現代文明給台灣人民，以期培育他們成為近代國民，同時又注入日本的國體精神，試圖讓台灣成為日本民族的一支，這種情形，可以說就是上述兩種時代精神的翻版。日本對台施行的同化主義，或可以「近代化」和「日本化」來加以把握，而此政策在統治台灣的半世紀當中，主要是以國語（日語）教育的方式來貫徹執行¹⁾。

由於接受西方現代文明，建設有文化的台灣，乃是台灣啟蒙運動的主要訴求，此又與殖民者所推動的近代化有所重疊，因此，面對日本化要求，台灣文學知識界和文學的反應也出現了複雜面貌。例如，1920年代的啟蒙運動，即一方面主張接受西方的現代文明和價值，另一方面又強調民族傳統的重要性；而在殖民體制已經確立、物質和工具的現代化也趨於完成的30年代，則在抗拒日本和認同民族上，出現部分弛緩的現象；到了日據末期，受到強硬的皇民化要求，許多小說更出現了處理認同日本民族和文化的內容。

以近代化和日本化為主要內容的同化主義政策，長期推動下來，逐漸產生「文明日本」和「落後台灣」的二元思考殖民論述，因此，30年代以後的小說創作中，多少出現接受殖民性、認同日本的人物。本文擬在此理解基礎上，以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為對象，就日本加諸於台灣人的殖民論述和文化優越性如何滲透到小說人物，以及在身份和民族認同上如何造成影響，進行分析探究。文中將以皇民化運動時期作為基準，分成前後兩個時期，並按照創作年代，一一考察小說人物接受殖民性的過程，以及作者的敘述態度。希望透過此考察和分析，能進一步了解殖民教育和殖民論述的建構、啟蒙現代性、殖民資本主義進展、皇民意識的強制等殖民性的運作和接受機制，同時也期待能進一步營造20世紀東亞文學的比較視野。

二、懷疑與批判：皇民化時期以前的殖民性接受樣態

1920年代，以反帝國主義和現代性反思為基調，積極批判民族不平等處境的台灣現

1) 陳培豐研究日本對台灣實施的同化主義時，將其內容分為「文明——國民」與「文化——民族」兩組概念，並以「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民族」的兩兩條路來加以說明。參考《「同化」の同床異夢》（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42-65。

代小說，隨著殖民體制日益鞏固，政治社會運動備受打壓，在其現實反映和批判上，逐漸呈現出較為複雜的樣態；另一方面，此時日文成為主要表現媒介已逐漸成形，有關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憧憬描述，也開始出現在小說內容當中。初期賴和、楊守愚、陳虛谷和蔡秋桐筆下的日本人，大部分還以壓迫台灣人的形象出現：譬如具有警察、法官、地方官等身分的日本人，主要被描寫為執法不公、任意適用法規或貪財好色、不知羞恥的人物；作者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在控訴台灣人民受到壓迫的同時，也不忘嘲弄日本人來突顯他們統治台灣的不正當性，以維持其批判的角度²⁾。

不過，20年代小說中也出現討好日本人的物，例如楊雲萍〈光臨〉（1926）中的保正林通靈，為了接待警察部大人（警察分局長），儘管沒什麼餘錢，還是硬著頭皮準備了酒菜，苦苦等待警察的光臨，可惜警察大人卻接受別人的招待，忘了他的邀請，以致白忙一場。保正如此巴望著警察到來，主要還是為了自己的顏面，他心裡盤算著如果保甲民看到警察大人造訪他家，並跟他飲酒的情景，他就能靠著警察的撐腰獲取各種利益。當然，如此情節的安排，也透露出作者藉以暗示警察執法不公的事實³⁾。

蔡秋桐的〈保正伯〉（1931）更加具體的呈現保正和警察的勾結狀況。小說中的保正李サン，是個逢年過節都要上納禮物，並使出各種手段以求能跟警察大人親近的人物。他原就是個無惡不作的流氓，一心甘願擔任日本警察走狗，一些官廳不予許可的台灣人慣習，如私宰家畜或賭博等情事，一旦被他發現，一定上告官廳大人，因而「全庄的人，不論大大小小，或是親是戚，都已知李サン是不可交的，大小事都不敢給他聞知，在這庄中個個都怨恨他，或是什麼，凡是官廳所能處罰的，都必定去報告，這個村庄被李サン鬧得真是雞犬不寧了。」⁴⁾ 他被選為保正，理由為「正經的庄裡人，也無有和官廳晉接作才能和時間；又且看見前任的保正大恭伯，一份家財因為做了保正，被官廳噲去一大半，一因為做保正的義務，像款待大

2) 有關賴和、楊守愚、陳虛谷和蔡秋桐的小說內容與日本人形象，參考崔末順，《現代性與台灣文學的發展》（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4），頁219-239。

3) 保甲制原本是清朝的地方統治制度，日本據台之後，為了殖民統治的方便，沿用此一制度。1898年8月，總督府公佈「保甲條例」，規定10戶為「甲」，10甲為「保」。保有「保正」，甲有「甲長」，任期二年，在自己家裡處理公務，無給職。

4) 《台灣作家全集：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174。

人等的事，著要奉行。而保正的權利，像甘蔗委員等有來路的又無才能可去取得一」⁵⁾ 從這些敘述，可以知道村民如何看待以官廳和警察為代表的殖民支配，以及其下屬單位保正的角色。李サン原本居無定所，自從當上保正之後，極盡阿諛諂媚能事的奉承警察大人，因而獲得他的信任，於是他利用村民的愚昧，蓋起自己的居處，進而在家裡開設賭場，毫不避諱的鼓吹村民賭博，以便從中圖利。他的騰達主要是「這金錢萬能的社會，保正伯一日學了過一日，手腕也就愈高妙，名聲也就愈堅固，應酬也就愈周到，大人的風俗也無一不知，三月三日啦，五月五日啦。舖排要體面，年尾的烏紗帽也要特別。一年透天的禮素，無一次欠缺。」的緣故。

可見，這兩篇小說人物的奉承日本人，充其量只是為了個人利益或面子問題，屈服於日本人的權力而已，並非真的憧憬日本文化，或者認同日本民族。而且，作者處理保正的人格和處事的態度上，都將他們設定為得不到村民信任的貪利小人或流氓，同時他們所奉承的日本人也以權力者形象出現，可見作者是以批判的眼神，來懷疑殖民政府繼承保甲制度的目的，特別是作者的筆鋒，集中於一味奉承日本權力者的台灣人身上，其背後隱藏的，是對日本警察沒有標準的執行法律和隨意行使權力的批判。日本推動的近代化，在此受到的質疑和批判充分顯露無遺。

另外，與上面兩篇小說不同，賴和〈阿四〉處理的是，一個接受日本殖民論述的年輕人，對他所接受的殖民教育內容逐漸產生懷疑和不認同，因而投入啟蒙運動的心路歷程。這篇小說的創作年代雖然不詳，但從中可看出賴和的自傳性格濃厚，推斷應是皇民化時期以前完成的作品。主角阿四是畢業於醫學校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理想事業充滿期待和抱負，不過當他步入社會，卻驚然發現現實與學校所教的竟是如此的迥然不同。他前往學校介紹的醫院赴任途中，即從鄰座的日本人口中，聽到有別於內地人，台灣人受到輕蔑的日本臣民的言談，「這句尖利的話，在阿四無機的心上，劃下第一道傷痛的刃痕。」⁶⁾ 阿四首次體會到內地人和台灣人之間存在「種族的分別」，因而開始懷疑殖民教育的宗旨。加上，抵達醫院上班的第一天，他真正目睹了種族差別的真相：台灣人只能拿到日本人一半的薪水、不能跟日本人同住、劣惡不堪的居住環境，以及院長只把

5) 同前註，頁174。

6) 《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頁244。

他看待為寫員或通譯員，並不認定他擁有醫生資格的鄙夷態度。他體認到自己一心渴望的理想事業已面臨幻滅危機，最後他毅然辭去工作，回到鄉里開業，同時投入「文化協會」的民眾啟蒙運動，啟導台灣人民認清來自日本民族差別待遇和法律執行不公造成貧窮現實的真相。

阿四的轉變，說明著殖民教育和殖民論述，在實際社會現實上站不住腳的事實。他在學生時代具有「遠大的心志」和「無窮的希望」，內心完全接受一視同仁的同化主義精神，但在實際生活上卻面臨各種不平等和民族差別境遇，驗證了同化主義論述的虛假。日本從佔據台灣初期開始，即持續實施現代教育制度，包括設立公學校，做為專為教育台灣子弟的初等教育機構，另外還成立包括醫學、技術等職業實業教育在內的中等教育機構⁷⁾。日本的殖民地教育，主要是在同化主義的基本方針之下，以國語教育作為實施手段，而國語教育的主要內容為近代化和日本化。這兩種基本方向，在實際教科書的內容中，分為「智」和「德」兩部分：「智」就是智能，指的是近代化，主要介紹近代文明，並啟導學生認知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合理性和啟蒙性；而「德」就是道德，指的是日本化部分，主要介紹日本的歷史、神話等固有文化和精神，並強調日本民族的優越性⁸⁾。由於同化主義的基本理念為內地延長主義和一視同仁，把台灣人編入日本民族乃其最終目標，因此在教育過程中，即不斷強調台灣人其實跟日本人並無差別，都屬天皇臣民的觀念⁹⁾。阿四接受這樣的殖民教育，自然會毫無懷疑的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然而他卻必須痛心地面對恣行民族差別的日本統治的虛偽性質，小說透過阿四感到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反差，傳達了身份和國族認同破滅的過程，揭露了同化主義一視同仁教育和政策只是口號的騙局，同時也證明出日本化教育已經產生龜裂的事實。

如果說上述三篇小說，透過人物的行為，披露了殖民主義近代化和日本化論述在現實生活中顯現出來的間隙與破綻，那麼接下來的幾篇小說，其人物則在有意無意的認同

7) 有關日據時期台灣的教育情形，參考林振中，〈日據時期台灣教育史研究－同化教育政策之批判與啟示〉，收於《國民教育學報》第16期（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2006，頁109-128）。

8) 參考陳培豐，前揭書，頁35-36。

9) 有關日據時期國語教科書的內容，參考蔡錦堂，〈日本據台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收入鄭樑生主編，《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1993），頁241-244。

日本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渴望成為日本人的過程中，表現了在內化殖民性程度較為嚴重的樣貌。陳虛谷的《榮歸》（1930），透過留學日本，學成歸來的台灣青年的行為舉止，探討青年知識分子傾向日本的心理狀態，以及在當時所謂「日本時代」，一般民眾所羨慕的「榮達」意義。《榮歸》中的再福，在通過日本高等文官考試後歸國的火車上，「有時偷眼看座中的日本人，視線一齊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愈覺得驕傲。他想對他們說，我是高文的合格者，是台灣人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國的秀才，斷不是依你們想的尋常一樣的土人，劣等民族」¹⁰⁾，流露出他接受了日本人為了統治方便而建構的日本優等、台灣劣等的民族論述。這個被扭曲的民族與文化認同，可說是殖民者加諸台灣人民身上的文化枷鎖，因此，接受此邏輯，反而證明了台灣人民處在不平等、受壓抑的狀況。再福在本地老紳宿儒集結的歡迎會上用日文演說：

- 老 人：他日本話說得很流利呀！可惜我們聽不懂，太殺興！
 第二老人：日本話定然是比台灣話好講，不然今天的宴客，全是台灣人，他何苦講日本話？
 保 正：他是到過日本很久的，恐怕是把台灣話忘掉了。
 老 人：笑話！真正豈有此理？不過是做官人講講官話罷了。
 青 年：方今是日本世界，講日本話就是尊嚴的表示，是一種的示威呢。
 保 正：凡事總要馬馬夫夫（虎虎），太過認真，官就做不成，錢就無處賺，勢力也使不行了（推動不了），是不是？¹¹⁾

透過他們的對話，可知老人與年輕人間的想法差異。年輕人認為講日本話是一種尊嚴的表示，一種高貴的象徵，顯示出其對日本文化的傾心與嚮往，相反的，老人則認為日本話只是官話，只須敷衍應付即可。老人的這種處世態度，在再福的父親身上也找得到，他不滿由於異族的統治，造成自己飽讀的詩書知識無法發揮功用；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又期待兒子的成功，能帶來升官發財與身分提升的機會，暴露出深植人心的劣根性。陳虛谷透過已接受日本性，並模仿日本文化的青年再福，以及藉此企圖提高身分的秀才的想法，揭示了「本地方第一名譽的事情」，以及「通台灣也寥寥無幾」的榮達意義。

10) 《台灣作家全集：陳虛谷、張慶堂、林林越峯合集》，頁56。

11) 《台灣作家全集：陳虛谷、張慶堂、林林越峯合集》，頁59。

與再福一樣，蔡秋桐《興兄》（1935）中的風兒，也是在日本念完書歸國的台灣青年，他只去日本讀幾年書而已，卻在他的身上找不到民族傳統或固有價值觀，他的生活方式已徹底改變成日本式。小說從風兒的父親興兄，如何為了兒子能夠出人頭地，蕩盡財產花盡心思，供兒子念書開始，寫到最後卻感到失望的心境轉變。興兄原本持有相當多的田地，但由於米價暴跌，加上為兒子風兒籌湊學費，所有田地幾已被典當抵押殆盡。他雖然等到了兒子學成歸國的那一天，但卻發現與大和姑娘結婚的兒子，已不再是他所期盼的風兒。回家的那天，風兒穿著「紋附的和服」，家鄉話也忘記了，連生活習慣也完全改變，祖宅是住不得了，直嚷著要搬出去住。「興兄傾家蕩產望風兒學成回來，顯祖榮宗，豈知道連那舊前庭『兄弟翰林』的燈號也不得搯！真世風不古了，人倫墜地了。」¹²⁾因此，自從兒子歸國之後，興兄過得日日不快，感到不如往常了。加上，連過年也等不到兒子夫婦的登門拜訪，他決定親到古都台南找兒子去，結果不認得公公的日本媳婦罵他為清國奴、馬鹿，而已現代化了的古也都完全變了樣。對他而言，兒子及以兒子為代表的現代式都市生活，包括飲食及生活習慣都是陌生的。於是不諳各種交通規則的興兄，即使是短短幾天也難熬過日，更令他懷念起自己的田地來。這篇小說透過純樸的老農所體會的異質感當作媒介，體現了對日本化的不適應與懷疑，小說雖未深入刻畫風兒的內心世界，但卻已塑造了對自己身份和民族認同毫無懷疑，毫無煩惱，完全同化於日本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台灣青年形象，從風兒完全忽視家人的犧牲和傳統習俗的描繪，可見此時殖民性的接受程度已到相當嚴重的地步。

這些人物追求個人榮達，並對別人誇示自己優越身份以自我感到滿足，與保正為了生存，腆顏屈服於日本警察有所不同，他們算是徹底適應及接受現代社會的運作機制和物質萬能的資本主義價值觀。事實上，1930年代的台灣，無論在城市或是鄉村，殖民資本主義體制基本上已被構築完成¹³⁾，而逐漸邁入以競爭為導向的社會。如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面確立，促使台灣轉型為現代社會，此時自然會大量出現像再福和風兒這種不顧家族或民族情分，徹底追求現實利益，並接受殖民性的人物。

12) 《台灣作家全集：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頁213。

13) 有關日據時期台灣的資本主義形成與確立，參考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台政》第三冊（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朱點人《脫穎》（1936）中的三貴，與上述係透過留學東京接受日本文化，進而內化殖民性的人物不同，他是在飽受民族差別待遇之餘，自發性的抓住機會而迫不及待想當日本人的例子。以優秀成績畢業於公學校的三貴，當上官衙的工友，但是想到微薄的薪水，以及被所有人使喚的卑職，因而覺得自己的未來是沒有出路的。他雖然喜歡同事兼日本人主任的女兒敏子，但也不敢表露自己的感情，只能慨歎「小國民是不應奢望大國民的」，而過著既不滿自己處境又羨慕日本人的生活。

他的思路在千迴百轉之後，依舊想到他的萬年給仕。啊！萬年給仕，一個月只賺得二十九圓五十錢！今年二十歲，一歲賺無一圓銀！假如每天免食用，一個年也不過賺得二百四十四圓！這些少少的薄薪水，怎夠得生活？

他想他要是內地人，做過五年給仕，也要昇做事務員了，月給至少也有五十圓，還有宿舍料，要是任官，到了一定年間，就有恩給可領…啊！內地人！生做日本人才得豐衣足食的…¹⁴⁾

不管如何精打細算，本島人身分的他，只能發出「當今日本天時，真是無處可討喰！」的歎息，因此，想出「著敢出生入死才有路用的」，「還要喰些險草…」。恰巧此時因滿洲事變失去兒子的主任，想要把女兒嫁給一個以後生子也不用當兵的本島人，三貴幸運地趁此機會，順勢成為他的女婿兼養子。結婚後搖身一變的三貴，代替敏子的職位被拔升為事務員，此時的他開始故意疏遠親生父母，甚至鄙視所有本島人，完全聽從妻子的意見行事。

三貴背叛家人和朋友，自視為日本人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脫離薄薪與萬年給仕的地位，可見在日本天下，台灣人的生存是多麼的艱辛。

當今日本天時，萬項世事都在維新了，什麼「善有善報」的古語，在他見聞的現實都和它相反；真是為善的要窮死，為惡的要榮達，這真正和古逆行了——「惡有善報」的。¹⁵⁾

14) 《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264-265。

15) 同前註，頁264。

從三貴分析現實的這段話中，可知作者把日本人當道的新時代，認定為一個「惡有善報」的險惡時代。三貴是一個有能力分析現實的聰明青年，原本對父母也極其孝順，小說描寫這樣的一個人，最終卻背叛同族和家人，徹底變成日本人，意味著他的行為並非只存在於個人層次，而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依此強化了批判的力度，可見作者對日本天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依然維持著批判的視角。三貴與前述阿四一樣都感到民族差別和種族歧視，但與阿四的投入抗日的社會運動不同，他反而渴望成為日本人，這告訴我們殖民統治已被確立，殖民地台灣的貧困與不平等結構，亦即是持續量產這種人物的條件。朱點人透過《脫穎》，強烈反映了殖民資本主義支配結構下，被壓抑的台灣人處境，在這種環境之下，台灣青年終究不得不接受日本傳播於殖民地的近代化和日本化殖民論述。

此外，在龍瑛宗《種有木瓜樹的小鎮》（1937）¹⁶中的陳有三，也是一個徹底內化日本性的知識分子。他在一個小鎮的鎮公所擔任會計助理，而這個小鎮原本是舊行政區域的廳政所在地，過去受到充分利用而相當繁榮，但在新市街遷移隔壁城市之後，開始走向凋落之途。小鎮儘管到處是豐饒的南國風景，但是地點最好的驛前路卻是花柳街，台灣、日本、朝鮮的賣春女子扯開嗓子叫著客人，市場前的馬路，「兩側燒焦似的黑柱子、腐朽的廂房，狹窄的亭仔腳下，豆粕與雜貨類雜亂並陳，傾斜的屋頂上處處長著雜草。封滿塵埃的雜貨店裡，商人像長了青苔的無情的臉，終日沉坐著。滿臉縱橫皺紋的老人，在亭仔腳的地上，伸出枯枝似的腳，銜著長長的竹煙管，懶懶枝打盹著。」這個陰暗而髒亂的小鎮雖然正在沒落，但卻也曾經受過現代化的洗禮。不過在陳有三的眼裡，居住在這裡的台灣人都是「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在這個小鎮當中，包括以富裕與否來評斷他人，並且可以為了金錢犧牲妹妹幸福的戴秋湖；認為買賣婚姻是一條「聰明地抉擇現實的路」，為了賺取嫁妝，而選擇金錢交易婚姻的洪天送；飽受早婚弊害而走上沒落之途的蘇德芳；還有金錢至上主義者林杏南；以及把玩弄女人當作嗜好的廖清炎等人，在陳有三眼裡都是既自私又貪婪，要不就是墮落的一群。他對自己的本島人同胞懷有一種輕蔑的態度。

16) 原載日本《改造》雜誌（1937.4），入選該誌第九回小說徵文的佳作推薦。

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不正是他的同胞嗎？僅為一分錢而破口大罵，怒目相對的纏足老嫗們，平生一毛不拔而婚喪喜慶時借錢來大吃大鬧、多詐欺、好訴訟及狡猾的商人，這些人在中等學校畢業的所謂新知識階級的陳有三眼中，像不知長進而蔓延於陰暗生活的卑屈的醜草，陳有三厭惡於被看成與他們同列的人。¹⁷⁾

像這樣，他照單全收的接受日本加諸台灣人的負面觀點¹⁸⁾，再加上他將現代化所帶來的物質中心思考，當成是台灣人天生的特質。不過陳有三認為這些卑賤的台灣人都過著陰暗的生活，連像自己這種中學校畢業的知識分子，只要是台灣人身分，也得忍受「沒有房租津貼，薪水又低，每月家計可真艱苦」的困境。因此，包括陳有三在內，他們的夢想是能夠儘早脫離貧窮的生活，過著與日本人同樣的生活水準。只要比較內地人與本地人的居住環境，就知道他們之間的差異有多大。日本人住宅在連翹的圍牆內，「舒暢地並排著，周圍長著很多木瓜樹，穩重的綠色大葉下，結著纍纍橢圓形的果實，被夕陽的微弱茜草色塗上異彩」，而愈來愈狹窄的街道上，小房子雜亂並處，台灣人住的馬口鐵皮的矮屋，簡陋到「連隔兩三間談話的聲音，也像傳聲筒似地聽得一清二楚。深夜裡鄰居睡覺翻身的聲音，也無遺漏地聽得到」的地步，而且住在這裡的台灣人個個都沒有教養，女人們整天大聲饒舌，餓鬼們髒得比泥鼠還髒，男人們喝了白酒就高談闊論。

因此，洪天送在這世間唯一的希望就是忍耐幾年後，升到一定的位置，住進日式房子，過著日式生活。陳有三想到這種情況，乃立志要在次年內通過普通文官考試，十年之內通過律師考試，以擺脫身為本島人的處境。他認為透過這個途徑可以實現兩方面的目標，一是改善自己的境遇，二是因勤學能獲得知識與人格的陶冶。不過這樣的希望，在同學廖清炎來訪交談後，卻讓他領悟到那只不過是個無法實現的白日夢。因為就

17) 《台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頁27。

18) 《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中所記述的台灣人形象是「髒」與「臭」，台灣人的信仰、寺廟、敬祖敬神的思想，被解釋為「淫祠邪教」，而台灣人對祭典、喜慶婚葬的重視，則被指為「與身分不相符合的浪浪費錢財」之陋習。另外關於台灣人的民族性，則用「利己的」、「無感激之心」等先入為主的偏見之語來形容。參見羅羅成純，〈龍瑛宗研究〉，收入《台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頁233-326。

第一個目標而言，廖清炎認為現在的高失業率與激烈的競爭現實，即使是通過律師考試，也無法提高生活水準，他舉自己所認識的朋友遭遇來證明這個看法；而關於第二方面的目標，他也提出知識無用論的說法。他認為無論如何充實知識，一旦碰到現實，知識可能反而成為束手束腳的桎梏。

「其實我們所生存的時代，正是反調的現象。從前的人但憑獨學力行便可立身處世，現在還有人抱著那種古色蒼然的理論理想，這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人。」（中略）「知識要抱著華麗的幻影時，也許可以幾分緩和生活的痛苦。但幻影終究會破滅。當喪失了幻影的知識一旦與生活結合的時候，則只有更加深痛苦而已。」¹⁹⁾

從廖清炎的話語，我們可以嗅出，當時的知識分子是不敢對時代現況抱任何的希望。這些觀點，對極力想擺脫台灣人身分的陳有三而言，無異晴天霹靂。特別是知識無用論，造成他極度的精神空虛，因為對陳有三而言，知識是唯一能讓他與日本人過著同樣生活的途徑，也是自己能遠離同族的唯一方法。

陳有三唯有擁有新的知識才感覺一種矜持，才能夠俯瞰群聚於他周圍的同族們。要他放棄新知識，簡直就是令他還元於被某些人所俾視的同族。要把他撞落於沒有教養而生活水準低得如同泥沼的生活，對他而言，是無法忍受的。²⁰⁾

對陳有三來說，具備如此重大意義的知識，在這種象徵著暗鬱、絕望的時代環境現實裡，不僅變得沒有價值，反而造成他精神上的負擔。而且從他們否定知識、原理、理想、創造性的想法中，可知當時知識分子對現代性抱持著極端負面的看法。他們認為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並不是在學校學的數學、古文等艱深的學問或創造能力，而只是能夠記些借貸數字，會打盤算即已足夠。譬如像官衙的事務員，只要能夠全神貫注於職務，工作確實，而且字體漂亮的實用性人物，即能勝任，它並不要求你會思考。在日益分工的社會，如機械般工作的人，才是現代社會所需。無法發揮創造性，也不需要創造性的

19) 《台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頁46-47。

20) 《台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頁50-51。

社會，就是他們面臨「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必然一片漆黑」的生存環境。在這樣的社會，知識或理想反是造成人的精神不幸的無用之物。從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助長壓抑、貧困、機會主義、失業與不景氣、劣等意識的殖民統治之下，完全喪失希望和生命力的日據末期的畸形社會面貌。

小說描寫一個非常鄙視同族，不管同胞死活，只是極力想擺脫本島人身份的人物，如何的喪失鬥志，逐漸沈淪。透過這個過程，它告訴我們的是，只要殖民地大環境不變，不管個人怎麼努力，台灣人終究無法克服貧困及卑賤身份的事實。另外，作者在結尾部分安排林杏南長子的故事，來顯示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角度；此人與陳有三不同，他夢想著建立民族全體的烏托邦和樂社會，設法找出造成黑暗絕望時代的原因，但是最後仍不免生病而死，同樣只是一個失敗型人物，由此可知，作者藉此表達出對日據末期黑暗時代負面看法的意圖。因此，接受日本性的人物，同樣在日本統治的社會中遭逢失敗，不管作者的意圖為何，這已深刻的呈現出日據末期台灣社會絕望又黑暗的真相。

如此，陳有三雖已內化日本性，並試圖透過知識的累積，設法改善台灣人的自我處境，但是在日本走上戰爭前夕的1937年，由於更加嚴重的社會競爭、機會不均等，以及受到民族差別等同化主義破滅的影響，終就還是成為失敗的人物，他的失敗預告了殖民主義中近代化的急速沒落，以及日本化時代全面抬頭的到臨。

三、屈從和認同：皇民化時期殖民性的接受樣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日本通過「國家總動員法」和成立戰時動員體制後的1938年，是日本在台的殖民支配政策方針發生重大改變的一個轉捩點。此後殖民政策的主調，主要是以有效完成逐漸擴大的侵略戰爭為目標。這些政策涵蓋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全面性領域。其中特別值得關切的是，所有政策的思想基礎，也就是殖民地支配意識形態，已經開始變質。當然從殖民初期以來，日本即採取的同化主義，其基調未曾改變；但是到了日據末期，其具體內容卻已開始變質，並且更加強化。這個進一步受到強化的

同化主義，稱為皇民化運動。皇民化的要旨，就是要將台灣人改造成真正的日本人，可見近代化和日本化，此同化主義的兩大內容，有明顯傾斜於日本化的現象。隨著中日戰事的延長，以及日本占領海南島，太平洋戰爭的危機升高，台灣作為戰略基地的重要性也因而與日俱增。日本為了有效達到皇民化的目的，從日文普及、生活習慣的日本化，到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改姓名、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國民總力運動，乃至徵兵制等措施，均全面性的展開²¹⁾。這些都可以視作是為了爭取戰爭勝利，而實施的預備措施。然而在面對可能失去民族性的空前危機之時，台灣作家也仍然無法逃避日本精神、戰爭動員、勤勞保國等許多皇民化課題²²⁾。

另外，日本所主張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是一種對抗西方諸國，強調亞洲民族團結一致的理念，他們力陳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思想所帶來的一些負面作用，全是西方思想和文明的產物，與日本無關，以此企圖塑造日本聯合亞洲民族對抗西方諸國的假象。日本為了貫徹此一理念，遂把自己的國家認同，強加在台灣人身上，並宣傳「日台一體」來說服台灣人接受皇民邏輯。日本的國家認同是建立在「國體論」上，主要是在宣揚神國思想上象徵「君民同祖」、「萬世一系」的擬血緣國家觀。這原本是日本為了因應西方文化侵蝕，並轉換為現代國家的基礎理念，但到了皇民化時期，卻擴大為「天皇歸一」、「八紘一字」邏輯，成為台灣人皇民化的理論根據。不過，在實際適用上，日本統治者的內心深處卻又不願承認台灣人為「皇國民」，所以形成了「差別待遇」、「台灣貶低為次等國民」的心態，並藉著以日本民族的優越性為前提的殖民意識形態，提倡「皇民練成」，企圖把台灣人改造成為了天皇願意奉獻生命的人。「皇民練成」不僅在語言、姓名、宗教、文化上進行日本化改造，也特別強調在思想、意識形態的「皇國民化」改造，由於其背後隱藏著一以台灣的種族、文化、生活和社會為落後、低賤，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種族、文化、社會為先進和高貴的種族歧視，遂而加重了台灣人身份和民族認同上的混亂和痛苦。

這些皇民化的推動對台灣人造成的身份認同危機、自我貶低等心靈傷害，成為這個

21) 參考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動運（1937~1945）〉，收入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頁161-201。

22) 有關皇民化時期小說的主要內容，參考崔末順，前揭論論文，頁319-352。

時期皇民小說的主要內容。周金波的〈水癩〉(1941)，描寫的是一個懷念日本生活，對日本價值觀完全表示認同的牙科醫生，強烈表達改造落後、封建的台灣人精神的故事。在這篇小說中牙科醫生的眼睛，就是代表日本對台灣人的視角，他看到來醫院接受醫療的少女母親，只在意賭博、追求流行，不顧醫生的建議，最後卻讓少女失去生命，而感到憤慨並失望地說出：「台灣還差得遠呢！」他所看到的台灣人，全是無禮、無秩序，並耽溺於流行和賭博的墮落一群，嚴重者甚至還超越基本常識範圍，到了讓人無法理解的地步；他對這些狀況表示非常的失望與痛心。不過，他的傷心和失望的原因，卻是在擔心如此落後的台灣人，將如何擔負起時代的使命。

以七七事變為轉捩點而加速進行的皇民練成運動，不用說，從站在領導階級地位的他們腳下向外擴展。它以點燃野火一般的氣勢，燒燬迷信，打破陋習。他在治療患者牙齒的當兒，並沒有忘記盡力宣傳它的必然性。當然，那把野火也在他身邊以點火的姿態帶給生活幾許變化，其實，應該說達成他自己多年的宿望比較恰當。²³⁾

可見，他所擔心未達到近代化標準的台灣，是怕在皇民練成的時代任務上落後。他把台灣式的寢室木板鋪換成榻榻米，而沾沾自喜為高水準的生活，對此他還頗有優越之感，他認為「島民是可以教化的，而且可以比所預想的更容易，更迅速地辦到—他所一直抱定的信念，被最近突然抬頭的強有力的自信迅速地推上去。」由此可以看出他已內化日本的二元殖民論述，並自發性的參與日本強加在台灣人身上的皇民要求。在這裡，皇民練成的方法，集中在破除迷信及陋習，此看似近代化課題，其實卻是重視日本式生活的呈現，也就是說，能夠改造為日本式的生活和價值觀，就可以趕上皇民隊伍，而榻榻米只是其中一個方法而已，其皇民練成的主要焦點還是在於物質的、制度的、習慣的層面的改造。

周金波的另篇皇民小說〈志願兵〉(1941)，已經脫離知識啟蒙、生活改善、合理的思考方式等近代化範疇的皇民練成，進一步發展為不顧合理性與否，只要能夠忠誠於天皇、能夠參與日本挑起的戰爭，即使是「精神合一」等非理性手段也無所謂的想法。

23) 《台灣作家全集別集：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頁3。

小說的開頭為八年前從日本留學歸國的「我」，為了迎接回台過暑假的表弟明貴，前往基隆碼頭時，恰巧碰到明貴的朋友——一個熱烈的皇民主義者高進六。小說中敘述者「我」，主要是擔負介紹兩個人意見的媒介角色，可知這篇小說的寫作目的，在於陳述兩人對有關皇民練成的方法上的不同意見。明貴和高進六，雖然是公學校的同學，但畢業後兩個人的處境卻大不同；明貴到日本求學念到大學，而高進六則是到日本人開的食品店做事，不過，無論是日語的使用、和服的穿法，或於日本精神的傾倒，高進六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明貴和高進六，不僅是認同日本文化的知識分子，對當時日本所推動的皇民練成、國民生活改善、改姓名、志願兵制等國策，也都表示極力贊成，並且還積極尋找成為堂堂正正的日本人的方法。只是在成為皇民的方法上，也就是皇民練成的方法上，各持不同意見而已：「我」雖然是嚮往及想念日本文化，但被迫接受故鄉父母的價值觀，在鄉里開業過日子，對皇民化運動採取觀望態度；相對的，「明貴」則努力尋找成為真正日本人的方法；而高進六更率先改名換姓，參加「報國青年隊」，積極投入皇民練成的實踐，最後還留下血書志願從軍。

拍掌時神明會引導我們向神明接近，向至誠神明祈禱就是達到神人一致的境界，古代的祭祀就是這種神人一致的理念，祭典就是從這裡開始的，政教一致就是皇道政治的根源，我們隊員從拍掌意識而能接觸到大和精神，努力去體驗大和精神，這種體驗是過去的台灣青年很少有人領會到的。

你的神人一致的想法也是不錯的，但是這種偏狹的想法對台灣人的將來並不好，被那種思想抱著轉實在受不了，我個人覺得台灣的中堅青年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感到有點恐懼，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很渺小的人種，這個你也很清楚，文化水準還很低的人種，這總是沒辦法，因為以前沒有過教養及訓練。但是現在皇民鍛鍊是目前的緊急課題，那些以前缺少的教養和訓練趕快去實行，這不就夠了嗎？趕快把台灣人的水準拉到和日本內地一樣，不就好了嗎？為什麼要用拍掌意識式癩腫東西，有何必要呢？²⁴⁾

前者是高進六說明他所參加的「報國青年隊」的皇民練成方法，而後者則是明貴對高進六的主張，提出懷疑的說辭。可見，明貴的說法，是透過啟蒙知識的傳播，讓台灣人學習到日本精神、進步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來達到皇民化的目標，從他所提到的「教

24) 同前註，頁27-29。

養」和「訓練」當中，可看出這一點；而高進六則主張透過日本政教一致的精神合一方式，短期間內便能達到皇民目標。兩人的主張，雖有時間的長短差異，但是無論是那一種，都是建立在先進日本和落後台灣的二分殖民論述上，傳播非改造台灣人不可的說法，而且最後的目的也都放在達到皇民練成上面。這說明近代化和日本化這兩種同化主義目標，到了日據末，如何發揮著它的效應。在兩個人尖銳對立的局面中，小說以明貴後來知道高進六的血書志願從軍事情，承認他才是能夠推動台灣的人才而結束，明白表示在皇民化問題上，真正要的是如志願兵一樣付出實踐，完全符合國策上所要求的時代任務。

在這裡，明貴所代表的台灣青年，毫無疑問的認定自己是「我在日本領土出生，我受日本教育的教育長大，我日本話以外不會說，我假如不使用日本的片假名文字我就無法寫信，所以我必須成為日本人以外沒有辦法。」那麼，小說中藉著敘述者「我」的口，不斷提出明貴的苦惱和痛苦，是什麼原因呢？「進六像被矇住眼睛一樣盲目亂撞，所以受不了了，這個傢伙，一直是提什麼日本人啦，大和心啦，根本不加以批評，所以我受不了了。」透過明貴的想法，可知他所要的並不是像進六一樣沒有批評能力的接受趨勢，甚且無條件的成為皇民，而是要透過明確的自我認知，找出適合的方式和態度之後，才能成為完完整整的皇民。他所謂批評的方式，就是否定現在的自己，去學習先進的日本文化，並在根本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上，持續進行自我批判，以找出說服自己的必然性。從這一點上來看，比起血書志願的進六，明貴顯然更是徹底的皇民主義者。

其實，從有關兩個人的敘述中，也可以找到相關的訊息。例如，進六為村裡大家公認的孝子，而明貴卻堅決反對父母的婚姻提議，排拒親戚、鄰居之間的情感，對台灣人的傳統價值一概顯露出鄙夷態度，認為這些都是台灣仍然落後的例證；進六看到街頭和建築的變化，相當肯定台灣的進步，相反地，明貴看到工人和小孩毫不注意的經過穿白衣的軍人面前，認為台灣終究還是沒起什麼變化。如此，重視內部變化的明貴的思考，與自己所主張要率先改造精神和價值觀的想法同出一轍，這與進六陷入一時麻醉狀態的精神相比，更加顯得他徹底的否定自己。加上，在小說結尾，明貴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認定真正的日本人，必須是像進六一樣用行動和實踐來達成日本所要求的皇民標準，因而「我很男子氣概的向他低了頭」，這表示他努力追求的目標，是精神和情感合一的皇民。因此，小說所描寫明貴的苦悶、煩惱和痛苦，就是台灣青年為內化日本所要求的皇

民形象而留下的心靈受傷的記錄。這些故事，周金波的另一篇〈無題〉（1944）中，也以同一內容和手法，再度反復變奏²⁵⁾，可見，當時日本以強制手段要求的皇民化，對台灣青年造成的心靈傷害是多麼的深。

王昶雄的《奔流》（1943）²⁶⁾，同樣描寫台灣知識分子為尋找真正皇民之路，而受到精神煎熬的心路歷程。非常有趣的，這篇小說與〈志願兵〉相比，不僅具有類似的情節內容，連敘述方式也採用同樣手法，都是透過敘述者「我」的角度來觀察兩種類型人物對皇民化的看法，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化。「我」是在日本求學回國當內科醫生的知識分子，偶然遇見朱春生與林柏年這兩個對日本性的接受有著不同看法的人。而「我」隨著與他們之間的接觸，歷經幾次心理上的變化。朱春生是個完全內化日本性的人物，不僅改名為伊東春生，還娶日本女人為妻。他和岳母住在一起，卻不願照顧自己的親生父母，平常穿和服，唱日本民謠，稱誦日本古典文學，也依著日本習俗過節。但伊東的姪子兼做他的學生林柏年，則不苟同伊東的態度和作法，指責他拋棄父母，只想自己過得快樂。原本傾向日本文化的「我」，在接觸兩人的過程當中，對日本性的想法逐漸產生了變化。而這個變化可說與小說主題有著直接關係，因為這篇小說透過「我」的觀察與推測，披露了兩個主角人物的內心。「我」對伊東認知的心理變化，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認同伊東對日本文化的態度與行為；剛離開生活十年的東京回國的「我」，在尚未脫離日本生活影響時，認識了熱衷日本文化的伊東，因而內心宛如碰到知己般的喜悅，精神也得到了慰藉。二是受到林柏年批判伊東的影響，以及親眼目睹伊東拋棄親生父母，追求日本人的極端行為後，對他「這種作風與觀點，真不敢領教」，並且認為「對生身父母是有所忤逆行爲，是千不該萬不該的」。三是經由柏年的母親，知道伊東留學東京時，與他父母有過嚴重衝突，還出錢幫助反對自己的柏年赴東京留學，因而諒解伊東「不為人知的心勞」，對他表示了同情。如此，「我」對伊東的認知，經過認同、懷疑、同情的態度變化，最後變得能夠理解他的處境和想法。不過這並不意味「我」對他的作為持肯定的態度，因為「我」在看到柏年從東京寄來的信後，贊成柏年「今後非做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不可。不必為了出生在南方，就鄙夷自己。…不論母親

25) 例例如〈無題〉中的哥哥和弟弟的想法差異，剛好能跟明貴和進六六的想法對應，而且其解決方式也很類似。

26) 原載於《台灣文學》三卷三號（1943.7）

是怎樣不體面的土著人民，對我仍然無限的依戀。即使母親以不好看的面目到這裡來，我也不會有絲毫畏縮的表現。致母親擁抱，就像幼兒一般，任其自然」的想法，並且原本愛戀日本氣候風土的「我」，也重新擁抱故鄉的土地。

內地冬晴燒印在心裏的我，這才恍然大悟，因而忘掉了故鄉常夏的好。使我感覺對鄉土的愛心不夠。今後，我非用這個腳穩重地踏著這塊土地不可。鄉土所體驗的陣痛，個人所嚐到的苦惱，看做是最後的東西，好幾次希望是最後的，現在不是應再忍耐一次嗎？²⁷⁾

從柏年的信中獲得啟發，確認了對自我土地的關懷。因此，在結尾安排對伊東感到同情，就是意味著對所有面對皇民化運動感到民族認同危機的台灣青年，表示憐憫。

在伊東認為，要成為一個道地的內地人，是要鄉土的土臭完全去掉，為了這個，連親生的親人也非踩越過去不可。在學校，或者在社會接受純日本化青年教育的年輕人，回到家門一步，就會被放到完全不同的環境裡。這裡有本島青年雙重生活的深刻的苦惱。所以，要克服這種苦惱，向著單方面，從正面加以挑戰，並且非把它踏得粉碎不可。還有，在這個時代，我們為了求得牢固的既成陋習的獲得解放，而不顧死活地戰勝了它，下一個世代的我們的子女，不就可以自然地變成自己的東西嗎？也許伊東是為了拋棄臭沖天的父母而贖罪，才會在感覺上格外激烈，對不成熟的生活方式感到戰慄的本島青年，懷著粉身碎骨的獻身精神從事教育去吧。對柏年所表示的好意，不可光把它當做好意。無論如何，伊東的白髮，若不是著不顧一切的戰鬥的一種表現的話，又會什麼呢？²⁸⁾

可見「我」對皇民化並非根本上的否定或拒絕，這由對伊東的再次理解和肯定，可知「我」終究是站在肯定皇民化的立場，只是在肯定接受日本性的同時，認為應把重點放在如何接受日本性上面，也就是達成皇民化的方式問題上。作者提出台灣青年在學校接受日本化要求，但回到家裡又馬上面臨著不同環境，顯示這兩個環境之間的差異帶給他們的苦惱。這表示作者深刻的檢討過皇民化的問題，其結論就是採取柏年那樣在台灣人的立場上，接受日本文化，也就是在徹底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認知上，找出自己能夠接

27) 《台灣作家全集：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頁362。

28) 同前註，頁362-363。

受的皇民之路。而這種結論傳達給讀者的訊息是，為了達成皇民化任務，台灣青年應更加積極改造自己。由下面的引文，可以知道小說強調的日本性是屬於哪一方面。

俗話說的日本精神，如果不通過古典來看，就沒有意思。譬如《古事記》，我們會被吸引的是心和詞，都具備著絲毫沒有歪曲的真率風格的關係。有個偉大的學者說，像幼兒依偎在祖父母的膝下，亮著好奇的眼睛，傾耳於那古老的故事那樣，有一種愉悅。離開了日本的古典，就沒有日本精神了。

我發現了真正的日本美，觸到了像稻草包著的溫暖的人情味，體驗到會把崇高的理想從根柢搖撼的事情…²⁹⁾

「不可思議的搖撼靈魂的感情」、「可稱為感動的東西」、「崇高的理想從根柢搖撼的事情」、「真正的日本美」、「溫暖的人情味」等都是皇民化時期，日本在殖民地極力推動的日本固有精神。由這些小說即能得以印證，當時日本把自己的文化和民族情感包裝為至高無上的價值，進而強加於台灣人民身上的事實。

追求皇民化之路，台灣知識分子受到的精神傷害和身份認同危機，在陳火泉的《道》(1943)³⁰⁾中，達到了極端的精神荒蕪狀態。《道》中的台灣人青楠，是一位戰戰兢兢一心想當皇民的知識分子。身為台灣製腦株式會社社員的青楠，完全接受了皇民化運動，絲毫未曾懷疑過自己不是日本人。他對日本的神話、歷史、文化，比任何日本人知道得還多，並且興致一來，能夠隨時創作俳句，可以說是皇民化的樣板人物。不僅如此，無論在生活方式、言行舉止，或是思考模式上，他都不斷努力的想當個真正的日本人。在戰爭期，為配合日本推動的增產政策，擔任樟腦蒸餾業務的他，即使一個人獨自在深山居住，從事艱難的實驗工作，但對他而言，那卻是個能夠效忠天皇的機會，內心反而只有充滿感激而已。他唯一的苦悶，僅僅來自於自己不是血緣上的日本人。

提到本島人，表面上很圓滑，用技巧的社交技術敷衍內地人；然而，背地裡就瞎喃喃，罵街咒人。熟悉許多這一類的本島人的股長，看到青楠常常旁若無人地，理直氣壯地，口沫橫飛地與內地人辯論，挖苦內地人，逼擊內地人，

29) 《台灣作家全集：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頁330、334。

30) 原載於《文藝台灣》六六卷三號(1943.7)

而對本島人則憎恨其含糊不清的態度，叱責其怠慢無賴，便覺得很有趣，因而對青楠感到不可思議的情分，又不得不暗中擔心他做得過火而惹禍。³¹⁾

青楠之所以生氣，並與內地人辯論、提出抗議，是自認為自己與日本人並無不同，但內地人卻不把他當成日本人看待的緣故。他成功開發出新的樟腦蒸餾技術，自認對國家增產有功，股長也肯定這點，卻因他不輸給內地人的強烈自負，惹來同事的不滿與嫉妒，在升遷上碰到阻礙。再加上，從平常即以知己看待自己的股長口中聽到「本島人不是人」的話語之後，青楠便失去了生活的意義。不過，他的不滿並不是來自內地人對本島人的歧視、民族差別或無法正常受到肯定的不公平社會體制，而是不管他多麼努力，仍然不被認為是真正日本人的現實。這一點造成他精神上的重負，他為了破除不是天生日本人的原罪，更加徹底地研究日本精神，學習日本的一切，渴求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我們必須是日本人。在其過程中，我們必須懂得什麼是生不帶來的，道道地地的日本精神。於是，我想從你們內地人身上找出這日本精神，想從你們的一舉一動學會這種日本精神。

說什麼因為招風太大啦。也許是吧。無非是：血的傳統，血的擁護吧！俗話也說：血比水濃麼，所以… 可是儘管如此，歸根究底，也沒有理由把人家一貶到底說他「不是人」呀。十年以來，一直服務到現在的我，並不是個想望「與所有人相等」的人，股長難道不知道這一點嗎？「對平等的人給與平等的東西，有差別的人給予有差別的东西」 這是真正的正義之言。³²⁾

青楠所要求的是依能力接受正當的待遇，但是現實是按照是否為日本人來評價人的價值。可見日本人高喊的平等、一視同仁，是多麼的虛偽。戰戰兢兢只是為了成為真正的日本人而努力的青楠，發現自己下意識中仍然隨口說出台灣諺語，懊惱的反省自己還沒到達日本人的標準，因此決定更加努力，並以此當作生活的目標。這時剛好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後方增產格外受到重視，青楠的發明因而備受肯定，在接受總督的增產戰士勳章之後，他的自尊心也才完全恢復。接著殖民政府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青楠為了向天皇奉獻生命，並實踐「皇民之道」，比起任何日本人都要先提出自願的表態。

31) 《民眾日報副刊》民68.7.25

32) 《民眾日報副刊》民68.7.26；8.5

「今天，最痛切的，必須堅決的重要問題是，怎樣才能使我們六百萬島民成為皇民道這個事情。」「今天，大日本帝國正在打不得了的大仗。在這個時候，描繪薔薇花者應該為薔薇花不惜以身殉；歌頌愛之歌者，應該為愛之歌不惜以身殉。各信其道，各盡其最大的努力，期望其最高的結晶。這就是所謂為國家做好本位的工作。只要努力，任何人都做得到。對了，誰都辦得到。可是，我想，僅僅如此，本島人不能就成為皇民，非朝著同一目標，對同一敵人，本島人與內地人一起流汗，一起流血，是不能成為皇民的。」（中略）
「所謂步向皇民之道就是死這麼回事。生與死兩者之間擇其一，就是速速安樂死這方面而已。我們現在站在歷史的關頭，要創造、創造血的歷史啦。（中略）今天，在南方，新的「國家」在產生；新的「神話」在流傳著。除了此時此刻，我們六百萬島民悉數不變成「皇軍」，什麼時候我們才能作為「皇民」而得救呢？就在這時，為君捐軀，就在此時了。³³⁾

小說透過努力改造自己，並徹底服從日本所賦與任務的台灣知識分子，最後擬以身殉的方式換取皇民資格的極端思考及行為，鮮明的揭露了皇民化帶給台灣人民的精神傷害。在《道》中強調的日本性，跟《奔流》中的內容一樣，指的是從日本的神話與歷史中抽離出來的日本固有精神。這個精神原本記載在《古事記》、《日本書紀》，而由「天照大神神話」所繼承，其內容為誰都可以變成皇民。但實際上，就如青楠所經歷的一般，充斥著差別與偏見。日本在推動皇民化運動時高喊的這個口號，只是為了圓滿完成戰爭任務所提出的幌子而已。可見戰爭期日本拋棄合理、知識和理性等現代精神，反以日本的神話為首的盲目及感性的日本精神來替代，其目的不外乎是促使台灣人的皇民化。青楠的例子，揭露了日本所主張學習日本文化和民族性，就可以成為同等受天皇愛戴的日本人的欺瞞謊話，更印證了台灣青年以血換血，才能有資格成為真正皇民的殘酷事實，從歷史練成，最後到血液練成的險難之路，就是皇民之道。

四、結語

本文以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為對象，主要觀察其小說人物的殖民性接受過程和樣態，

33) 《民眾日報副刊》民68.8.15

來分析日本在殖民地台灣所推動的同化主義，對小說人物造成的影響，以及作者敘述這些人物的視角和態度。1937年中日戰爭開戰之後，日本為了因應推動戰爭的必要，其殖民地政策採取了強硬的同化主義路線，有鑑於此，本文以皇民化運動時期為基準，大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來進行考察。

考察結果可以發現，在皇民化以前的小說中，接受日本性被視作是爭取個人利益或謀取生存的一個手段；而在皇民化時期小說中的人物，則完全依照日本推動的皇民化理念來接受殖民性，從台內一體到皇民練成，都造成民族和身份認同上嚴重的困頓和危機。至於作者的寫作態度方面，皇民化以前的小說，大部分都還維持否定的視角，以不信任的態度批判巴結日本人權力者，以及嚮往日本的小說人物；但皇民化時期的小說，是以接受日本殖民性的人物作為主角，直接刻畫出他們追求日本文化及民族性，成為皇民的心路歷程，呈現出對此人物理解和認同的態度。

在此殖民性接受過程當中，審思從1920年代到皇民化時期，施行同化主義的推移變化，就可看出從近代化急速傾斜到日本化的傾向非常濃厚。此外，殖民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經濟上民族差別狀況，以及二元的殖民論述所造成的民族差等政策，都是成為讓台灣青年逐漸接受殖民性的一大原因。也就是說，1930年代台灣正逢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殖民體制逐漸鞏固之際，自發性認同於殖民性的人物開始出現。這說明日本所宣傳的一視同仁政策，在落實現實生活上，已面臨幻滅的事實，而小說人物的紛紛接受殖民性，也證明了同化主義的欺瞞性質。

而到了皇民化時期，日本拿出更強化的國家主義來要求台灣人的皇民化，以利戰爭的推動，這在台灣人民的身份認同上，造成了空前的壓力。該時期的小說人物，不僅熟知日本歷史和文化，平時穿著和服、過著日本式生活，甚至還跟日本人結婚，或參與戰爭後方支援事業等，想盡辦法成為真正的皇民，不過他們終就還是無法如願，最後只得選擇血書志願從軍，或以血換血的獻出生命，可知皇民化所造成的台灣人精神荒蕪是有多麼的嚴重，如此，逐漸加深的殖民性壓迫，對台灣人心中所造成的身份、民族認同危機和精神荒廢，可以說是殖民主義所留下的最為嚴重的傷害。

<Abstract>

The Waste Land under Colonialism: Process of Emergence of
Coloniality in Taiwanese Novel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hoi Mal So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Taiwan becoming a Japanese colony in 1895 can be regarded as a result of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Japan,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be westernized, overthrew its feudal system during the rule of Emperor Meiji. Thi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prevailing capitalism then, allowing Japan to join the ranks of western empires in colonizing other countries. Taiwan, being a victim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ecame the first overseas colony of Japan.

The assimilation policy promot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aiwan aimed to convert Taiwanese people into part of the Japanese race by spreading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Taiwan, modernizing Taiwanese peo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educating them with the national spirit of Japa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reating Taiwan as an extension of Japan homeland and everyone treated alike. The dual discourse of colonization which shaped the concept of civilized Japan and barbaric Taiwan gradually emerge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promotion of the assimilation policy, which centered on modernization and Japanization. This study targets Taiwanese novel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explore and analyze how such discourse and cultural supremacism imposed on Taiwanese people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ere reflected on the fictional characters in these novels and how they affected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 : Taiwanese novel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oloniality,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투 고 일 : 2008년 7월 15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8월 15일